

May 2013

## The Discourse of Revolt and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Yun F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Fan, Yun. 2013. "The Discourse of Revolt and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3): pp.101-11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3/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反抗性话语与当代文论研究

范 昀

**摘要:**反抗性话语在当代文论中呈现泛滥之势,激进的政治话语与文艺理论的结盟形成一种特别值得人们重视的现象。如何评价和反思文艺理论的激进化也成为亟待文论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对该问题西方学者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超越话语政治回归审美伦理将是当代文论未来发展的新出路。

**关键词:**反抗 话语文论 激进 政治

**作者简介:**范昀,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与伦理美学、文化批评及启蒙思想史研究。电子邮箱:vanyun@zju.edu.cn

**Title:** The Discourse of Revolt and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revolt is gaining increasing popularity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radical politics and literary theories has also alerted scholarly attention. One demanding question is how to evaluate and reflect the radical trend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While Western researchers have made timely responses to the issue, Chinese scholars need to extend the research field and return from discursive politics to aesthetic ethics.

**Key words:** revolt discourse literary theory radical politics

**Author:** Fan Yun, Ph. D., is a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ing political and ethical aesthetics, culture studies and thoughts of Enlightenment. Email: vanyun@zju.edu.cn

在上个世纪的尾声,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发现,社会上和思想界都出现了逃跑或者破坏的冲动。观察者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圣奥古斯丁生活的充满恐惧和愤怒的时代,见到当时招摇过市的预言家、魔术表演者以及受到欺骗的信众或持怀疑态度的讽刺作家”(巴尔赞 258)。如果说,巴尔赞在十年前看到了某种趋势并深感忧虑的话,那么在今天,他的担心已成事实。在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作为话语形式的“反抗”(revolt)已经蔚然成风。尽管今日的世界局部动荡总

体和平,但种种以“反抗”、“革命”、“激进”以及“批判”为题的作品却已悄然占据了人文学术领域的半壁江山。<sup>①</sup>对不少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历史似乎已经终结的时代,能打出反抗的旗帜并喊出革命的口号是多么激动人心。在当代最时髦的文化理论中,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导师们又一次以新的方式赢得了大批信众。的确,如理查德·桑内特所言,“将仇恨政治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恒定力量已经变成历史研究的风尚了”(桑内特 354)。

在当代文学/文化学者的视野中,“反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反抗”既意味着突破既有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标准,也体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控诉与反叛。就如女性主义者克里斯特瓦

(Julia Kristeva) 说的那样:“幸福只存在于反抗中。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挑战那些可让我们判断自己是否自主和自由的阻碍、禁忌、权威、法律时,才能真正感到快乐”(克里斯特瓦 11)。理论则成为了这个时代用于反抗的最佳武器:“从本质上讲,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孔帕尼翁 9)。

由此,在当今西方的学术文化领域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反抗性话语”。这种“反抗性话语”包括了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到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再到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哲学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它们的观点互不一致,分歧明显,但在“反抗”的立场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该类话语以其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激进的社会批判,在大学的文学系安营扎寨,并广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因为“这些运动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重要性:它们开拓了研究和理解人类世界的新通道”(布东 30)。

然而这些打着反抗的旗帜,摆出正义姿态的理论令人困惑:这些“激进话语”在人文学科中渐占上风,却对社会现实影响有限;批判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宝贵传统,但当代的文化批判似乎徒有话语,不见精神。这提醒我们对“反抗性话语”进行反思:为什么要反抗?反抗的初衷与目的是什么?反抗性话语对当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何某些反抗话语的愤世嫉俗反倒能够为它赢得不菲的市场份额?文学理论又能从这些激进话语中得到怎样的启示?

在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就此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批判性的意见。首先,最严厉的批评来自科学界。如果说当年的“索卡尔事件”<sup>②</sup>代表了科学界对这类反叛性话语的某种嘲弄的话,那么两位美国科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R.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出版的《高级迷信》一书则是对当代“学术左派”的系统批驳。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这类反抗性话语暴露出不可饶恕的对科学的无知和对真理的敌视。因为无论对哪项智力事业来说,怨恨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它已经出卖了左翼知识分子,泄漏了他们在言行上大而无当的底色(格罗斯 莱维特 8)。其次是来自右翼的批评,芝加哥大学的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对这类学术左派所表现的“愤怒”感到愤怒,认为“愤怒是人的合理反应,但它隐蔽

了理性或给理性带来危险”,他重点批判了当代反抗性话语所宣扬的相对主义,认为理性正面临两个威胁,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已经了解最重要的东西的真理,另一种是说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真理。这使得这类激进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布鲁姆 311)。

再者,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将这类话语斥之为“扯淡”(bullshit),还将耶鲁大学斥之为“全世界的放屁大本营”,因为那里有“耶鲁四人帮”。他对“扯淡”与“说谎”做出区分,指出扯淡者不像说谎者那样拒绝“真”的权威、反对真实,他根本就不在意真实。就影响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更大的敌人(法兰克福 75)。最后是来自左翼内部的批评。特里·伊格尔顿、理查德·罗蒂以及佩里·安德森等人也对文化理论感到失望,“看来像似它反叛的时刻,其实已是政治衰退的肇始”(伊格尔顿 42)。因为当代的反抗性话语的重点已不在政治,而在游戏。

上述批评说明,反抗性话语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西方民主制度保障了思想市场的有效制约和平衡,使得这类反抗性话语的负面性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必要的警惕。但当这类话语漂洋过海,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之内的时候,问题变得更错综复杂。一方面,现实语境的差异造成了这类理论话语很难实现充分的本土化;另一方面,西方学界对这类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并没有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反抗性话语究竟给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它们拓宽还是限制了对理论的想象?较之于更大规模的理论译介,国内学界对这类问题的反思相对薄弱,尤其是西方学界的成熟反思并未引起文论界的重视。<sup>③</sup>为此,本文的目标即在于清理文论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总结和归纳西方知识界对这种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同时也为中国文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 二

在当代所有人文社科的理论话语中,当代文艺理论学科的话语是最激进的。“反抗性”也成为了识别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标志。“我认为,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的唯一任务应该是揭示形式

反抗和哲学反抗体验的价值,因为这两种反抗可以保持我们内心生活的活力”(克里斯特瓦 12)。“理论在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生有反骨的。理论的有趣与真意不在于其神乎其神或精致严密,也不在于实践或教学方面,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充满活力的冲击,以及固有观念对它的顽强抵抗”(孔帕尼翁 7)。当代的文艺理论教材里充斥着大量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话语,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花样迭出。如新近国内出版的《21 世纪批评述介》介绍了不少西方新近涌现的批评理论,如散居族裔批评、性别与跨性别批评、有色女性和女性主义批评、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以及批评等等。<sup>④</sup>这些新热点的出现,又给不少理论话题的制造者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问题在于,为何政治的激进主义会与文艺理论结盟呢?为何它们会最终选择在文艺理论领域安营扎寨?文艺理论与反抗话语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亲缘性?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反抗性话语在文艺理论的安营扎寨跟左翼运动的变迁有关。西方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在自 60 年代起的左翼运动中出现分化,身居学院的文化左派认识到光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改变制度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将兴趣的中心从社会科学系换到了文学系,哲学、文学研究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成为了文化左派政治斗争的新阵地。罗蒂指出,改良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差别在于,前者阅读托马斯·盖根的《你站在哪一边?》之类的书,该书解释了工会的衰落过程,而文化左派则阅读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该书同样精彩,但阐述得过于抽象,不可能衍生出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因为它的“主要敌人不是一套经济方案,而是一种思想形式或思维方式”(罗蒂 70)。文化作品试图通过这些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来完成对整个制度的文化改造。因此,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激进化首先是出于整个左派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有人认为,其实这是左翼力量在现实改革出现重大挫折的背景下的一种无奈之举。<sup>⑤</sup>

其二,文论的反抗性是与艺术的反抗本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抗的要求部分说来是美学的要求”(加缪 281)。文学家加缪就认为:“创造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

术与抗议的标志”(299)。文艺作品除了具有宗教信仰、消遣娱乐的意义之外,它还具有政治上的反抗价值。尤其在当代的艺术界,这种反抗性被摆到了很高的位置。据相关学者考察,艺术对社会的反抗始于 19 世纪,它成为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武器。浪漫主义将艺术说成是世间生活最高层次的表达,抨击布尔乔亚庸碌刻板的日常生活。马修·阿诺德的作品则为文化对抗社会体制提供了伦理上的支持;以左拉的《我控诉》作为标志性事件,预示着文学家进一步地介入到政治的行动和批判之中。此后出现的先锋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延续并激化了这种批判,并加剧了艺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

文艺理论是对文学现象和审美文化的理论回应和批判性思考,因此激进化的艺术作品造就了激进化的理论建构。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艺术创造对席勒的政治美学的开启不无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 20 世纪的前卫艺术运动不无关系;而西方 60 年代以来艺术文化的种种变迁,也为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桑塔格的“新感性”以及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提供了新的灵感。从这个角度来说,文论的激进化其实得益于整个文艺领域的激进化。可以说,杜尚式的艺术造就了杜尚式的文论,达达主义的作品造就了理论上的达达主义。

然而事情并不止这么简单,文论的激进化得益于艺术实践的激进化,但也超越了这种激进化。当代文论的发展早已无法满足自己依附于文艺创作的卑贱地位,而是试图翻身做主人,并实现自身的艺术。有的时候,并不是艺术的激进化实现了理论的激进化,而是理论的激进化造就了艺术的激进化。正如英国作家 C. S. 路易斯所言:“事实不在于我们为了欣赏作者而需要批评家,而是我们为了欣赏批评家而需要作者”(路易斯 1)。有时人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才去阅读《情感教育》,也经常是为了理解雅克·里纳尔《小说的政治阅读》而去借阅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文学的审美体验与理论的政治阅读彻底脱钩,使得激进的文艺理论成为了另一首独特的“政治诗”。“文学理论无法应用,所以也无法‘证伪’,它应该被当作文学来看”(孔帕尼翁 245)。于是,文艺理论成为一种独立于文

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理论游戏”，悠游戏谑，自我反讽，并为一批批“话语艺术家”的粉墨登场提供了舞台。在罗蒂看来，与其将德里达与传统哲人放在一起，不如将其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罗兰·巴特、波德里亚、茱迪斯·巴特勒等人身上，有人就认为波德里亚的作品更适合作为科幻小说来阅读，因为它通过夸大当前的趋势来预测了未来（凯尔纳 19）；齐泽克 2011 年在占领运动上的颇具煽动性的演说，很难让人将其与传统的学者形象联系起来；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更是把巴特勒形容为“穿着花衣的吹笛手（Pied Piper）”。

不过，激进化的艺术毕竟不同于激进化的理论。激进的艺术通过感性的震撼力量冲击人心，而激进的理论往往通过巧妙的修辞蛊惑人心；艺术以真诚甚至鲁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理论的偏激却往往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按苏珊·桑塔格的说法，与其把艺术的激进理解为一种社会批判，还不如理解为一种对感觉的更新和生活的丰富。“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桑塔格 348）。此外，艺术的激进中包含了信念，反抗中包含了肯定，“没有任何艺术可存在于完全的拒绝中”（加缪 326）。

理论则不然，“理论的精神，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论战的精神，是低着头一条死胡同走到黑的精神”，理论家们“侃侃而谈且反复强调，结果常常把自己的命题或反命题推至荒谬地步，甚至自己推翻自己，信口雌黄，让对手不战而胜”（孔帕尼翁 8）。如果孔帕尼翁对理论的概括稍显温和的话，那么波德里亚的言说则让人不寒而栗：“我和其他那些使用武器的人一样，是一个使用理论的恐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留给我们的唯一对策就是理论暴力，而不是真理”（凯尔纳 18）。世界上只有呈现虚无主义的艺术，而没有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艺术，但却有着形形色色虚无主义的话语在破坏着人类现实生活的肌体。这也是人们在反思现实灾难的过程中会在理论上寻找根源的原因所在。“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波普尔 135）。卡尔·波普尔为二十世纪所作的总结值得我们重视，闭门造车的

理论可能对现实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有时思想上的恐怖主义带来的破坏性毫不逊于现实中的恐怖主义。艺术上的激进和理论上的激进看似一致，实则不同。历史证明，最激进的革命政治往往是激进艺术审查最可怕的敌人。因此，对二者作区分尤显必要。

此外，文艺理论的自主发展也造成了当代艺术精神的异化。按照巴尔赞的看法，“理论出现在原创出现之后，所起的作用根本不是促进将来的创作，而通常是有害于将来的创作，其方式是将艺术家变为有自我表现意识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受到‘观念’的束缚或误导”（巴尔赞 24）。大量观念艺术的出现也使得当代的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因此完全有理由检视反抗性话语在当代文艺实践和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 三

正如前文所言，西方学界已就反抗性话语的局限性作了全面且深入的反思。虽然各种批评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在一些核心问题的观察上达成了共识。这意味着存在于反抗性话语中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之辞，而是值得中国同行重视并引以为戒的客观评判。为此，本文基于一些代表性的批评文献，对西方学界的反思作了归纳和总结。这些批评是基于一种普遍性的考察，并不否认存在例外的情况。反抗性话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复杂性思维的缺失。**反抗性话语对问题的解释有一种模式化的倾向，它们对具体的问题分析普遍趋于简单，这体现了当代理论研究者思想上的懒惰。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阴谋论或建构论为代表的思维模式，即把所有文化都理解为一种建构，即一个群体为达到对另一群体的压迫或控制的目的而进行的建构。

在法国、英国或是美国，许多大学界人士要么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典籍的激发，或是获得了尼采主义教旨的感召，从而发展出了——通常是极富技巧性地——一大批各式各样的、而且或多或少带有睿智的理论，不过如今，他们也因此而声名狼藉。（布东 74）

在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看来,很多知识分子专心于创立一些过于简化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思想市场上并没有遭遇到太明显的困境。它们通常将一切文化或文本视为某种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表征(从男权中心主义到欧洲中心论),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常常会被化约为多少有些浮夸的简单词语或者一句多少经过精心编排的口号的伪理论。这些经过简单化处理后的伪理论为解读文学和解释世界提供了便利。无论这些理论作品在对文本的具体分析过程显得如何繁复琐碎,都不能掩盖它们在主导理念上的简单与教条,有时仅通过标题和章节的目录我们即可把握作品的核心脉络与主要观点。比如阅读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只要我们抓住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霸权这条核心线索,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就不会遇到困难;再比如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无非就是通过各种电影文本和时尚文化为个案,用以解释黑人女性是如何受到主流文化的压迫的(胡克斯 11-12)。这种思维上的模式化,在左右意识形态的理论作品中都有所呈现,美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反动的修辞》同样在不少右翼学者的作品中发现了“反动的修辞”,这样的修辞也“由根深蒂固的神话所支持”(赫希曼 34)。这种模式化教条化理论言说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很少能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思想的洞见,只能佩服作家那种自圆其说的才华。当然对同一个小圈子的人们来说,还能体会到一种志同道合的感动,但这种感动却是以放弃复杂思维为代价的。

**第二、现实常识感的消逝。**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该类话语脱离现实。它表现在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知和对人类常识的必要尊重。人们通常会被作者的大胆判断所震撼。比如斯特尔特·霍尔称:“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所居住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讲是反人性的。”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低级时代中”,一切都是“景观,一切都是商品,我们称为边缘化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被社会摒弃之人”(克里斯特瓦 17)。这样的判断是如何得出的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现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正如罗蒂所言:“走入这些左派分子的思想世界,就是离开原来的世界进入一个民主政治成了滑稽剧的哥特式世界”(罗蒂 67-71)。许多反抗性话语恰恰就是

建立在这样的“哥特式世界”这样的独断前提之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已经歪曲了我们的世界观,并构建了一系列虚假的二元对立:比如个人生存与社会体制、人文理想与资本主义、女性主义与家庭生活。这些理论将问题纳入到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中,却从未反思这些尖锐的冲突是否是必然的和现实的。

对常识的敌视也是这类理论话语的主要特征。孔帕内翁指出:“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常识的崩盘。理论抗拒常识,批判常识,将常识斥之为一系列(作者的、世界的、读者的、风格的、历史的、价值的)幻象,文学研究若想成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就必须摆脱这些幻象”(孔帕尼翁 305)。从“作者之死”到“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对常识的否定本有其积极意义,它能为人们摆脱陈旧观念,拓展思维的角度提供指引。但它却以不可妥协的方式拒绝了常识的必要性,尤其是以逻辑主义的标准的理由来衡量文学与生活世界的“无根据性”。因此这就必然遭到常识的反击:即便有再多的理论试图让人们明白,“经典”来自于白人男性的霸权,但人们依然会兴致勃勃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中追寻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足迹,他们喜爱《包法利夫人》胜过《法妮》,巴特在入睡前三津津有味地品赏《基督山伯爵》。这就是理论无法取胜的原因(孔帕尼翁 244)。

**第三、语言表达的迷失。**反常识的激进学术立场与行话、术语的泛滥并行不悖。《高级迷信》的作者指出,辨认这类反抗性话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他们是否喜欢使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术语。因为这些理论似乎认为:掌握了词语(words)、术语(terminology)和词典(lexicon),也就是掌握了世界(格罗斯 莱维特 84)。同样在巴尔赞看来,“如今,阅读批评著作就是在充斥着这类字眼的句子中艰难行进:张力、律动、控制、结构、质感、活力、限制、反讽、抒情性;语象、顿悟、维度、疏离、隐喻;隐喻在其中占据首位”,这些批评的语言“听起来与时装广告的字眼完全一样:晦涩模糊的形象形成在奢侈品中穿行的幻觉”(巴尔赞 81)。但学术左派却把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术语辩称为“颠覆”,视浅显的语言为压迫的工具予以排斥。他们认为:“在一个聪明而有力地使用‘清楚’和‘过分简单化’的语言,系统地破坏复杂且有批评性的思想的文化中,‘清晰’的语言起着主宰作

用”(拉希 131)。

人们往往会被这样的解释所迷惑,相信这些晦涩的背后隐藏着真理,或认为语言上的革命会动摇整个罪恶制度的基础。但这极可能是这些“扯淡艺术家”打造出来的“高级迷信”,让很多学术从业者无法像孩子那样看到“穿着新装”的国王。同属左翼阵营的伊格尔顿也对这样的语词泡沫感到愤怒:“如果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写出诸如上面这一类话(‘在这目的论列入地理学计划的世界中,爱好者原本就初具规模的准概念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功能完全冻结。’),也是不可原谅的”。文章可以难懂,但不可以晦涩。“激进的文化理论一意孤行地艰深晦涩,这就让人觉得特别可耻”(伊格尔顿 74-75)。这种对术语的无度挥霍最终掏空了这些词语本身的内涵,代表了“心灵的空虚”。

此外,这种话语写作也能为理论家推卸道德责任提供借口。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指出“像麦克唐纳这样的老一辈精英分子写出的都是干脆有力、清楚明白,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懂的句子。但是,一般而言,文化研究的拥护者们拿出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英语、行话和句子,这足以让一个十年级的英语教师欲哭无泪”,而且“无法完整写出完整的句子同无法做出坦率的政治判断或许是互相关联的”。他以当代不少知识分子在拉什迪事件上的表态为例,指出所有重要的事件在这些话语理论家那里成了证明他们理论才华的手段:“问题不在于知识分子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方”。这充分证明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缺乏应有的担当。

**第四、公共关怀的失落。**晦涩的学术表达反映出这类“反抗性话语”的极端自恋与自私。尽管反抗性话语一直打着正义的旗号,但它们的正义显得相当狭隘。因为它们从未从基于一个公共利益的视角出发来追求正义,而仅仅诉诸边缘群体的利益以及个人的欲望,并将此视为唯一的正义。“新一代看问题截然不同,激进派不再全神贯注社会公正。将60年代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的需要和权利。”托尼·朱特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反抗的目的并非公共正义,而是私人利益。它们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私人目的,而不是公共的善,并导致了很流行

的说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朱特 61)。

这些激进话语所呈现出来的“反抗”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反抗”拉开了距离,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关于反抗,加缪曾做出过相当精辟的解释。他看到,反抗所依托的价值一定是超越于个人的,基于公共性的价值。“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并且终于为此死去,这表明他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而牺牲的。他宁肯死亡也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权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这种权利置于他自己之上。他于是以价值的名义而行动,这种价值观念尽管依然模糊,他至少感觉到它对他与所有的人是共同的”(加缪 18;24)。因此,“反抗”绝不意味着破坏一切,它包含了节制与限度,它必须建立在人的团结与政治友爱的基础之上,一旦团结与友爱被破坏,“反抗”就会沦为“反叛”(或“造反”),这种让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治疗似乎比这种疾病本身更容易引起误导,并且还会成为致命之恐怖的一个同谋。(皮尔逊 240)

为此,我们决不能“将康德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意涵的批判同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对社会不满的、情意意涵的批判混淆起来”(布东 99)。因为前者具有公共性,而后者具有强烈的私人性;前者是基于公共正义的反抗,而后者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公共关怀的缺失,使得“反抗性话语”从宏大的乌托邦政治革命蜕变为自怨自艾的文化运动,从轰轰烈烈的革命政治萎缩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校园政治,也从真枪实弹的实践斗争演变成自我迷恋的语词游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校园里的政治冲突大部分和词汇而不是和红色根据地有关”,伊格尔顿失望地看到,当代文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政治世界而是要确保政治世界中自己的文化地位”(伊格尔顿 47)。克里斯托弗·拉希更是看到,这种“精英反叛”的背后其实是追名逐利的野心。<sup>⑥</sup>

**第五、媚俗的伪激进反抗。**“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理论是否是新兴的;但是要想知道它是否正确却并非易事”(布东 98)。布东此言无疑硬生生地揭了话语理论家的老底,他们的目标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去占领一些机构,尤其是教育和交流机构,以便能够在那里树立他们所信奉的思想。他援引帕累托提出的理想类型(实用-毫无用处、真实-谬误),对理论进行了四种分

类:具有实用性且真实的理论完全有可能被推崇,但是具有实用性却存有谬误的理论也同样有此机会。那些真实却尚无用处的理论一般来说需要耐心等待,直到他们的实用性被证实或者被察觉。只有那些既存有谬误又毫无用处的理论乖乖地待在了历史的纸篓里(布东 83)。而正是这类实用但却充满谬误的理论,在一时间迎合了某个社会群体的这样或那样的需求,或者说就是那种久已存在的对新生事物的需求。

此外,如果某种道德评价与某一公众的感性碰撞在一块,抑或是它回应了那些凝聚了某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状组织的教条,它便能够具有很高社会回报性。比如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对中产阶级的批判与其说是一项理想主义事业,似乎更像是一场场时尚的派对。正如格罗斯和莱维特指出的那样,这种激进主义其实是令人愉快的,“是没有危险的激进主义。这不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不利,反而会促进他们的事业”。在这种“政治正确”的鼓励下,这些激进主义完成了与消费主义的结盟,展示出极大的媚俗性,于是“学术上的废话与政治上的哗众取宠在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了”(雅各比 101)。他们可以从不向常识让步,却可以硬让读者相信。这些对语言的模糊性以及真理和个性令人困惑的地位进行各种“不切实际的纯理论探讨”,其背后是追名逐利的野心,因此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学术的伪激进主义”(拉希 135)。

#### 四

2001年,著名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学死了吗?》的小书。在这本书中,米勒一反他往日惯用的艰涩的笔调和咄咄逼人的文风,带着某种怀旧的笔调怀念起往昔的岁月。研究了大半辈子批评理论的他,突然怀念起儿时阅读文学的那种体验:“我对第一次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时天真的轻信,有一种忧伤的怀念,那是一种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收回的东西。”而恰恰是多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使他不再能够拥有这样的阅读体验,那种“抵制文学的力量”,导致了文学的死亡(米勒 229-30)。希利斯·米勒的例子充分地说明了当代文艺理论的问题所在,即便是它的创建者和捍卫者,也充分体会

到了它所造成的困境。当代文论所造成的文学之死,是反抗性话语无法辩解的罪责。杜威说过:“任何根据专业艺术理论著作而进行的单一化阅读,永远不会产生出优秀的艺术评论”(转引自蒙特豪克斯 45)。而当代的文学理论恰恰就是在鼓励这样的阅读习惯。

与此同时,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对“文化左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尽管文化左派曾通过他们激进的文化抗争树立了一种“政治正确”,尤其是改善了人们对少数民族裔的态度,但他们的现实影响力却十分有限。<sup>⑦</sup>因为在他们看来,“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这些蓄意“颠覆的著作的作者笃信他们在为人类自由服务。但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书上爬下来,回到适度的抽象层次上去讨论一条法令、一个条约、一个总统候选人或一个政治策略的优点”。像“无限责任”、“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不可通约性(unreachability)”、“不可再现性(unrepresentability)”这样的概念在一些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时候可能很有用,然而,当我们承担起社会责任时,这些概念有害无益。“用这些词语来思考我们的责任就像罪感一样,是政治活动的绊脚石”。为此,罗蒂认为在政治上真正有抱负的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它应该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罗蒂 67-71)。

米勒和罗蒂分别从两个侧面道出了文学理论在当代所处的尴尬局面。从文学研究的层面来说,这类反抗性话语颠覆了常识世界,导致了文学的死亡,并异化了人们对世界的正常感知;若从政治实践的层面来说,这类话语在改造社会制度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和实践力。故而,无论从文论的政治化还是政治的文学化角度看,这种结盟并没有带来太多实质意义的思想创造和卓有成效的现实改进。因此,如何突破和超越现有的文论格局成为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在内共同需要面对的课题。

为此,本文提出文论“去政治化”的必要性和回归伦理学的可能性。这种“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文论要告别政治,而是要告别一种狭隘的党派政治和校园政治。“反抗性话语”的问题根源就在于这种政治理念上的狭隘性和小家子气。<sup>⑧</sup>对文论的去政治化既不是出于右翼的意识形态偏



见,也不是基于文艺的自主理念,而是基于对个体生命的伦理关怀,在文学理论“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完成对“大政治”——即伦理学——的回归。俄国诗人布罗茨基说过:“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布罗斯基 32)。文学对于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伦理意义多少遭到了这个“极端年代”的放逐。在西方学界内部一直有一种呼吁“伦理复兴”和“回归伦理”的声音,从莱昂内尔·特里林、韦恩·布斯、斯坦利·卡维尔再到玛莎·努斯鲍姆,这些学者所作的睿智洞察和精彩见解理应得到今天所有关心文论发展的同行们的重视。尤其对于中国当代的文论建设而言,这些伦理批评的资源显得格外重要。<sup>⑨</sup>

由于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建设起步于“后文革”的时代背景,基于长期以来道德理想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主宰地位,因此作为对长期压抑的反弹,国内在引进和吸收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是有意识地排斥了道德伦理批评。这使得国内对马修·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白璧德、特里林到布斯的这条文学伦理批评的线索缺乏系统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自 90 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媒介时代的来临,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和对革命年代的怀旧共同造成了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抗性话语”在国内的持续走红,目前来看,这种趋势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sup>⑩</sup>国内文艺理论界尽管在翻译和评介这些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了成果,也进一步扩大了知识界的视野,但终究未能将这些理论资源真正落实于本土性的问题思考与文化建设中去,反倒是在文学研究和现实批判上出现了一些误区与困境。<sup>⑪</sup>

在对“反抗性话语”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理应重视西方文论资源中那些虽显陈旧,但却更为厚重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因为它能真正从文学中挖掘出人生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复杂性。正如布斯所言:“倘若批评家们的争论不是源于将他们自己的体系粗鲁地强加于个人的文学作品或是大量的文学类别之上,而是挑战他们所选择的体系,述说他们直接面对这些体系时的真正想法以及思想变化”(布斯 190),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论从“激进的话语政治”向“复杂的现实人生”的伦理回归。只有真诚地面对现实,向生命的丰富与神秘致敬,我们才能对中国未来的文论事业持

有充分的信心。

#### 注释[Notes]

①单从国内译介的西方文论作品中就可看到反抗性话语在当代文论中的走红。如《日常生活的革命》(鲁尔·瓦纳格姆)、《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克里斯特瓦)、《精英的反叛》(克里斯托弗·拉希)、《激进哲学》(阿兰·巴丢)、《文化与抵抗》(爱德华·萨伊德)等。

②阿兰·索卡尔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写了一篇“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一些左派主张。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一家权威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登在《社会文本》题为《科学大战》的一个专刊上。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就在另一个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③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有意识地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如南帆教授以“反讽”为视角对后现代文论作出分析。除了虚无主义之外,这种反讽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如何将反讽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中抢夺出来则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理论挑战,为此他提出“负责任的反讽”。参见南帆:“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任的反讽”,《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徐岱教授重点批判了当代文论研究中泛滥的“话语现象”。他指出这种只关注学术话语权的“校园政治”从未真正关心现实生活,反倒树立了一种有害的范式,遮蔽和吞没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话语现象的问题症结在于脱离经验的“理论主义”,超越“话语美学”,重返以问题为导向的美学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参见徐岱:“话语现象与文艺美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④参见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的《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伊格尔顿认为这一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就已体现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幻想。夹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群体,可以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31。

⑥伊格尔顿、齐泽克、阿兰·巴迪乌、朗西埃、南希等人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重新为普遍性辩护。此外还有贝尔·胡克斯,在《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的最后一章也提出通过回归爱的伦理来探讨重新建构社会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⑦弗朗西斯·福山在2012年的《外交事务》1、2月刊上撰文《历史的未来》中也批评了文化左派在现实政治上的无力。参见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ggc/article\\_2012010851638.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ggc/article_2012010851638.html)

⑧徐岱在《话语现象与文艺美学》一文中指出“‘解构’既不涉及以政权为核心的‘大政治’，更不涉及以人权为核心的‘元政治’，它只是围绕着学术圈内话语权的‘小政治’”。参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⑨像韦恩·布斯、玛莎·努斯鲍姆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当代文学理论提出批评，并提出了当代文论回归伦理的可行性。

⑩继福柯、德里达与克里斯特瓦之后，又有一波新的理论家（如齐泽克、阿兰·巴迪乌、朗西埃以及阿甘本）在中国学术界粉墨登场，开启了新的“理论旅行”。

⑪这些问题已在某些文章中提到，就代表性的案例而言，比如论文《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细读伊沙〈张常氏，你的保姆〉》集中体现了反抗性话语对文学批评的戕害，该文作者将一首水准极其一般的诗歌作品通过意识形态眼光的细读塑造了这首诗歌的政治批判性，这对文学教育和批评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尼采的道德-政治思想研究》，宗成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Ansell-Pearson, Keith. *Nietzsche contra Rousseau*. Trans. Zong Chenghe, et al.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5.]

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严忠志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Barzun, Jacques. *The Culture We Deserve: A Critique of Disenlightenment*. Trans. Yan Zhongzhi,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编，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Bloom, Allan. *Giants and Dwarfs*. Ed. Zhang Hui. Trans. Qin Lu, et al.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3.]

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Booth, Wayne. *The Revival of Rhetoric: 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Trans. Mu Lei. Nanjing: Yinlin Press, 2009.]

雷蒙·布东：《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Boudon, Raymond. *Why Intellectuals Do not Like Liberalism*. Trans. Zhou Hu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Brodsky, Joseph. *Children of Civilization*. Trans. Liu Wenfe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0.]

阿尔贝·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Camus, Albert. *The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Lv Yongzhe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10.]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哈里·G·法兰克福：《论扯淡》，南方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Frankfurt, Harry G.. *On Bullshit*. Trans. Nan Fangshuo.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保罗·R·格罗斯、诺曼·莱维特：《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孙雍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Gross, R. Paul, and Norman Levitt.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Trans. Sun Yongj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王敏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Hirschman, A. O..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Trans. Wang Min,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贝尔·胡克斯：《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Hooks, Bell. *Outlaw Culture: Resisting Representations*. Trans. Zhu Ga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Jacoby, Russell.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 Trans. Yao Jianbin. Beijing: Xinxing Publishing House, 2007.]

托尼·朱特：《沉痾遍地》，杜先菊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

[Judt, Tony. *Fares the Land*. Trans. Du Xianju. Beijing: Xinxing Publishing House, 2012.]

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Kellner, Douglas.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Trans. Chen Weizhen,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

lishing House, 2008. ]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林晓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年。

[ Kristeva, Julia. *The Sense and Non - Sense of Revolt*. Trans. Lin Xiao, et al.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2009. ]

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

[ Lasch, Christopher.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rans. Li Danli, et al. Beijing: Zhongxin Press, 2010. ]

C. S. 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徐文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Lewis, C. S.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Trans. Xu Wenxiao. Shanghai: ECNU Press, 2008. ]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Miller, J. Hillis. *On Literature*. Trans. Qing Liy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皮埃尔·约特·德·蒙特豪克斯:《艺术公司:审美管理与形而上营销》,王旭晓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 Monthoux, Pierre Guillet. *The Art Firm: Aesthetic Manage-*

*ment and Metaphysical Marketing*. Trans. Wang Xuxiao. Beijing: People's Post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Popper, Karl. *Lesson of This Century*. Trans. Wang Lingxiao.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 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 Rorty, Richard. *Achieving Our Country*. Trans. Huang Zong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

[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Trans. Li Jih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07. ]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

[ Sontag, Susa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Trans.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03. ]

(责任编辑:王 峰)

